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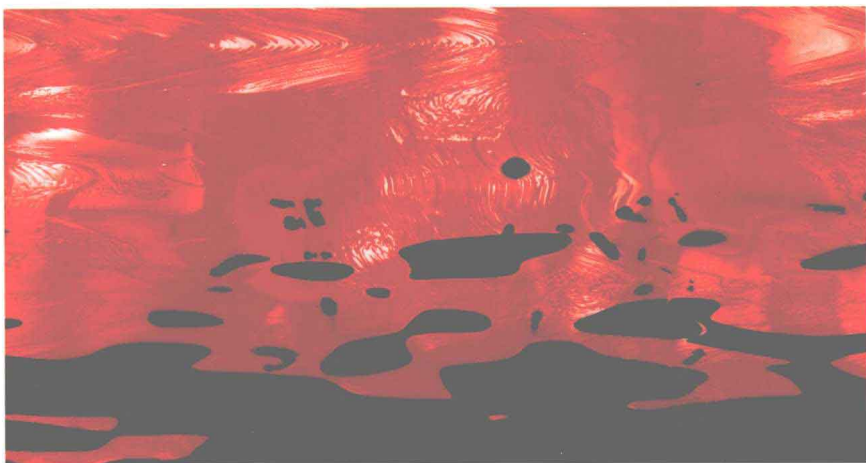
史上最全最美最值得珍藏的名家经典，读者遍布华人世界
流传一个世纪的文字，打动亿万读者的心灵，影响几代人的幸福人生

★ ★ ★
超值金版
29.00
★ ★ ★

闻一多

大全集

闻一多 著



闻一多擎起一支红烛，照亮了整个中国！在和平盛世的今天，
我们仍需要这种“红烛”精神，长民族记性，倡和谐未来！

他是一位不畏强权的斗士，
他是一位孜孜以求的学者，
他是一位热情澎湃的诗人，
以《红烛》《死水》开一代诗风！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
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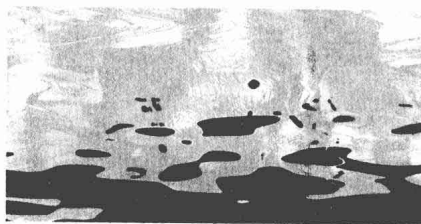
——闻一多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史上最全最美最值得珍藏的名家经典，读者遍布华人世界
流传一个世纪的文字，打动亿万读者的心灵，影响几代人的幸福人生

闻一多大全集

闻一多◎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闻一多大全集 / 闻一多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104-3196-8

I. ①闻… II. ①闻… III. ①闻一多(1899~1946)-全集 IV. ①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4075 号

闻一多大全集

作 者: 闻一多

责任编辑: 赵 涛 任延军

排版设计: 于超英 刘 杰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510千字

印 张: 26.5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196-8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前言

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民主的战士

闻一多是在近现代中西文化大交汇、大碰撞中成长起来的，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家。他是一个诗人却走出了书斋，走出了象牙塔，走到前沿阵地，最后为民主英勇献身，倒在了白色恐怖的血泊当中。他是一个敢于出门不带钥匙，出了门就没想再回家来的英勇斗士，他是一个直面黑暗的真正猛士，他是一个有血性的、无愧今生的男人。

闻一多，原名闻家骅，字友三。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下巴河的一个书香门第。13岁时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此期间，他的诗词才华逐渐展现，相继发表了诗、赋，并担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闻一多投身于校园运动的洪流当中，他积极书写诗词、发表演说，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前往上海参加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1922年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的同时，怀着极大兴趣专研诗歌、发表诗评，并在国内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红烛》。1925年，闻一多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担任《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此后，他相继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等校任教。1928年1月，闻一多出版第二本诗集《死水》。1932年秋，闻一多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又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历时两个多月，徒步3500华里，期间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的作品。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任教授。1937年抗战开始后，闻一多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争取民主自由。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于当天下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开创了诗的新格律之先河，并形成了自己独具风格的诗和散文的语言。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要进行新诗格律的人，提出诗人要敢于和善于“戴着镣铐跳舞”，并认为应该对新诗的语言、形式、音韵、节奏进行研究，相对于“自由”必须给以必要的“限

制”。除了新诗，闻一多还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并开创了国学研究的新境界。

此外，闻一多对“美”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说，“抒情之作，宜整齐也”，“中国艺术中最大的一个特质是均齐，而这个特质在其建筑与诗中尤为明显。中国的这两种艺术的美可说是均齐的美——即中国式的美”。他提出著名的“三美说”，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闻一多曾说：“诗人最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其爱国之心，可昭日月！面对黑暗和暴政，闻一多敢于拍案而起，他是站起来就不再倒下的人，不惜牺牲性命来追求真理，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经典作品是经过时间的冲刷后存留下来的精品，它不一定是最优美的语言，却一定是人性最恰当的注解。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不论时间如何的流逝，它依然是那个能在读后给读书人以感悟的书架上的“知音”。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更多更好地了解闻一多及其作品的需求，本书精心收录了闻一多不同时期的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分为诗歌卷、演讲卷、文艺评论卷、散文·杂文卷以及古典文学研究卷、序跋卷、书信卷，以求更完整、更丰富地反映和表现闻一多一生的思想艺术全貌。此外，为了让读者们更好地理解作品，部分文章中还附有注释、按语，希望可以帮助广大读者更好地做到无障碍阅读，见解未必准确，仅供参考而已。

《闻一多全集》^① 序

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

朱自清

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本集里承臧克家先生抄来三十二年他的一封信，最可以见出他这种三位一体的态度。他说：

我只觉得自己是座没有爆发的火山，火烧得我痛，却始终没有能力（就是技巧）炸开那禁锢我的地壳，放射出光和热来。只有少数跟我很久的朋友（如梦家）才知道我有火，并且就在《死水》里感觉出我的火来。

这是斗士藏在诗人里。他又说：

你们做诗人的人老是这样窄狭，一口咬定世上除了诗什么也不存在。有比历史更伟大的诗篇吗？我不能想象一个人不能在历史（现代也在内，因为它是历史的延长）里看出诗来，而还能懂诗。……你不知道我在故纸堆中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方单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

① 1948年7月15日，朱自清在自己的病十分危重的情况下参加了清华学生自治会举行的闻一多死难两周年紀念会。当晚朱自清用低沉的声调报告《闻一多全集》编辑和出版情况。1948年8月底，由朱自清与他人共同整理出版的闻一多的遗著《闻一多全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蠢鱼，不晓得我是杀蠢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学者中藏着诗人，也藏着斗士。他又说“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后来的他却开了“民主”的“方单”，进一步以直接行动的领导者的斗士姿态出现了。但是就在遇难的前几个月，他还在和我说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

闻先生真是一团火。就在《死水》那首诗里他说：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这不是“恶之花”的赞颂，而是索性让“丑恶”早些“恶贯满盈”，“绝望”里才有希望。在《死水》这诗集的另一首诗《口供》里又说：

可是还有一个我，你怕不怕？——
苍蝇似的思想，垃圾桶里爬。

“绝望”不就是“静止”，在“丑恶”的“垃圾桶里爬”着，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不能静止，在《心跳》那首诗里唱着：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方尺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所以他写下战争惨剧的《荒村》诗，又不怕人家说他窄狭，写下了许多爱国诗。他将中国看作“一道金光”，“一股火”（《一个观念》）。那时跟他的青年们很多，他领着他们做诗，也领着他们从“绝望”里向一个理想挣扎着，那理想就是“咱们的中国”！（《一句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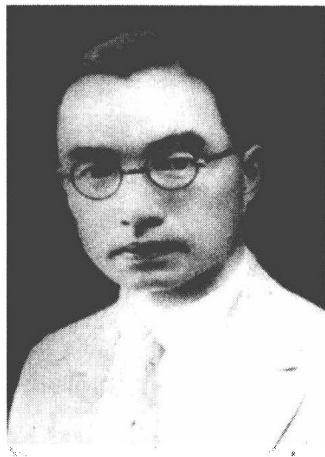
可是他觉得做诗究竟“窄狭”，于是乎转向历史，中国文学史。他在给臧克家先生的那封信里说：“我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的今天外，还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同在三十二年写作的那篇《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说起“对近世文明影响最

大最深的四个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都在差不多同时猛抬头，迈开了大步”。他说：

约当纪元前一千年左右，在这四个国度里，人们都歌唱起来，并将他们的歌记录在文字里，给流传到后代……。四个文化，在悠久的年代里，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线，分途发展，不相闻问。然后，慢慢的随着文化势力的扩张，一个个的胳膊碰上了胳膊，于是吃惊，点头，招手，交谈，日子久了，也就交换了观念思想与习惯。最后，四个文化慢慢的都起着变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总有那么一天，四个的个别性渐渐消失，于是文化只有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也不必改变。

这就是“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句话的注脚。但是他只能从中国文学史下手。而就是“这角落”的文学史，也有那么长的年代，那么多的人和书，他不得不一步步的走向前去，不得不先钻到“故纸堆内讨生活”，如给臧先生信里说的。于是他好像也有了“考据癖”。青年们渐渐离开了他。他们想不到他是在历史里吟味诗，更想不到他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告诉臧先生，“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他创造的是崭新的现代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一篇巨著虽然没有让他完成，可是十多年来也片断的写出了一些。正统的学者觉得这些不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就戏称他和一两个跟他同调的人为“闻一多派”。这却正见出他是在开辟着一条新的道路；而那披荆斩棘，也正是一个斗士的工作。这时期最长，写作最多。到后来他以民主斗士的姿态出现，青年们又发现了他，这一回跟他的可太多了！虽然行动时时在要求着他，他写的可并不算少，并且还留下了一些演讲录。这一时期的作品跟演讲录都充满了热烈的爱憎和精悍之气，就是学术性的论文如《龙凤》和《屈原问题》等也如此。这两篇，还有杂文《关于儒·道·土匪》，大概都可以算得那篇巨著的重要的片段罢。这时期他将诗和历史跟生活打成一片；有人说他不懂政治，他倒的确不会让政治的圈儿箍住的。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的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读卜辞，读铜器铭文，从这些里找训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为清，字佩弦。浙江绍兴人。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散文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他的主要作品有《雪朝》《踪迹》《背影》《春》《欧游杂记》《你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国文教学》《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等。

话的源头。从本集二十二年给饶孟侃先生的信可以看出那时他是如何在谨慎的走着正统的道路。可是他“很想到河南游游，尤其想看洛阳——杜甫三十岁前后所住的地方”。他说“不亲眼看看那些地方我不知杜甫传如何写”。这就不是一个寻常的考据家了！

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研究神话，如高唐神女传说和伏羲故事等等，也为了探求“这民族，这文化”的源头，而这原始的文化是集体的力，也是集体的诗；他也许要借这原始的集体的力给后代的散漫和萎靡来个对症下药罢。他给臧先生写着：

我的历史课题甚至伸到历史以前，所以我研究神话，我的文化课题超出了文化圈外，所以我又在研究以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

他不但研究着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生活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从他后来关于文学的几个演讲，可以看出他已经在跨着这一步。

然而他为民主运动献出了生命，再也来不及打下这个中国文学史的基础了。他在前一个时期里却指出过“文学的历史动向”。他说从西周到北宋都是诗的时期，“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都是诗史”。可是到了北宋，“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上前“接力”的是小说与戏剧。“中国文学史的路线从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他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而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于是乎他说：

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却没落了，那许是因为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的向小说戏剧发展，等于说我们要死心塌地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敢的测验。

这里强调外来影响。他后来建议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语言学系，打破“中西对立，文语不分”的局面，也有“要真正勇于受”，都说明了“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那句话。可惜这个建议只留下一堆语句，没有写成。但是那印度的影响是靠了“宗教的势力”才普及于民间，因而才从民间“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人民的这种集体创作的力量是文学的史的发展的基础，在诗歌等等如此，在小说戏

剧更其如此。中国文学史里，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玩意儿，不是一本正经。小说戏剧一直不曾脱去了俗气，也就是平民气。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化的运动开始，知识阶级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说戏剧这才堂堂正



1944年合影，左一朱自清，右二闻一多。

正的成为中国文学。《文学的历史动向》里还没有顾到这种情形，但在《中国文学史稿》里，闻先生却就将“民间影响”跟“外来影响”并列为“二大原则”，认为“一事的二面”或“二阶段”，还说，“前几次外来影响皆不自觉，因经由民间；最近一次乃士大夫所主持，故为自觉的。”

他的那本《中国文学史稿》，其实只是三十三年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的大纲，还待整理，没有收在全集里。但是其中有《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分为四段八大期，值得我们看看：

第一段

本土文化中心的抟成一千年左右 第一大期黎明夏商至周成王中叶（公元前二〇五〇至一一〇〇）约九百五十年

第二段

从三百篇到十九首一千二百九十一年第二大期 五百年的歌唱周成王中叶至东周定王八年（陈灵公卒，《国风》约终于此时，前一〇九九至五九九）约五百年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周定王九年至汉武帝后元二年（前五九八至前八七）五百一十年第四大期一个过渡期间汉昭帝始元元年至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前八六至后一九五）二百八十一年

第三段

从曹植到曹雪芹一千七百一十九年第五大期诗的黄金时代东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载（一九六至七五五）五百五十九年第六大期不同型的馀势发展唐肃宗至德元载至南宋恭帝德二年（七五六至一二七六）五百二十年第七大期故事兴趣的醒觉元世祖至元十四年至民国六年（一二七七至一九一七）六百四十年

第四段

未来的展望——大循环第八大期伟大的期待民国七年至……（一九一八……）

第一段“本土文化中心的转成”，最显著的标识是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花纹变为殷周的铜器花纹，以及农业的兴起等。第三大期“思想的奇葩”，指的散文时代。第六大期“不同型的馥势发展”，指的诗中的“更多多样性与更参差的情调与观念”，以及“散文复兴与诗的散文化”等。第四段的“大循环”，指的回到大众。第一第二大期是本土文化的东西交流时代，以后是南北交流时代。这中间发展的“二大原则”，是上文提到的“外来影响”和“民间影响”；而最终的发展是“世界性的趋势”。——这就是闻先生计划着创造着的中国文学史的轮廓。假如有机会让他将这个大纲重写一次，他大概还要修正一些，补充一些。但是他将那种机会和生命一起献出了，我们只有从这个简单的轮廓和那些片段，完整的，不完整的，还有他的人，去看出他那部“诗的史”或那首“史的诗”。

他是个现代诗人，所以认为“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他说新诗得“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

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做得不像诗了。也对。说得更准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太多“诗”的诗，和所谓“纯诗”者，将来恐怕只能以一种类似解嘲与抱歉的姿态，为极少数人存在着。在一个小说戏剧的时代，诗得尽量采取小说戏剧的态度，利用小说戏剧的技巧，才能获得广大的读众。……新诗所用的语言更是向小说戏剧跨近了一大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他在态度上，在技巧上的种种进一步的试验，也正在进行着。请放心，历史上常常有人把诗写得不像诗，如阮籍、陈子昂、孟郊，如华茨渥斯、惠特曼，而转瞬间便是最真实的诗了。诗这东西的长处就在它有无限度的弹性，……只有固执与狭隘才是诗的致命伤，……

那时他接受了英国文化界的委托，正在抄选中国的新诗，并且翻译着。他告诉臧克家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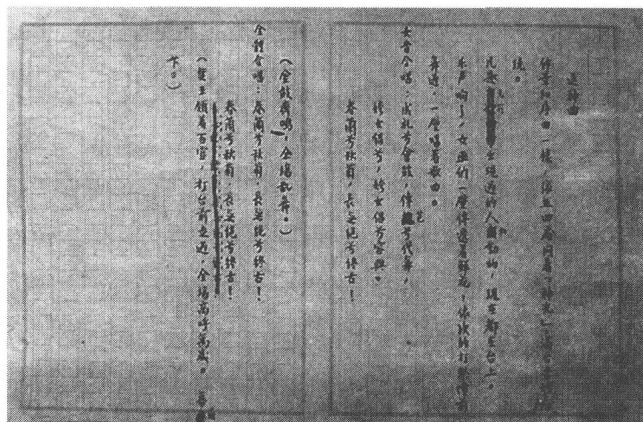
不用讲今天的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我并不是代表某一派的诗人。唯其曾经一度写过诗，所以现在有揽取这项工作的热心，唯其现在不再写诗了，所以有应付这工作的冷静的头脑而不至于对某种诗有所偏爱或偏恶。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我想我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

是的，一个早年就写得出《女神的时代精神》和《女神的地方色彩》那样确切而公道的批评的人，无疑的“是颇合乎选家的资格的”。可惜这部诗选又是一部未完书，我们只能尝鼎一脔！他最后还写出了那篇《时代的鼓手》，赞颂田间先生的诗。这一篇短小

的批评激起了不小的波动，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他又在三十四年西南联合大学“五四”周的朗诵晚会上朗诵了艾青先生的《大堰河》，他的演戏的才能和低沉的声调让每一个词语渗透了大家。

闻先生对于诗的贡献真太多了！创作《死水》，研究唐诗以至《诗经》《楚辞》，一直追求到神话，又批评新诗，抄选新诗，在被难的前三个月，更动手将《九歌》编成现代的歌舞短剧，象征着我们的青年的热烈的恋爱与工作。这样将古代跟现代打成一片，才能成为一部“诗的史”或一首“史的诗”。其实他自己的一生也就是具体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可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我们不能甘心的！

三十六年八月，清华园。



闻一多《九歌》手稿

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

郭沫若

最近吴辰伯先生把《闻一多全集》的稿子从北平给我寄了来，我费了两个礼拜的功夫细细地校读了两遍，校补了一些誊录上的错误和夺落，填写了一些古代文字，更把全部的标点统一了。全稿的字数我没有过细计算，大约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吧。在这里面关于文化遗产的部分要占四分之三，关于近代学识，特别是参加民主运动以来的著述，仅占极少数。因此从这整个的遗稿上便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一棵茁壮的向日葵刚刚才开出灿烂的黄，便被连根拔掉，毁了。

“千古文章未尽才”，这是夏完淳哭他的内兄钱漱广的一句诗，这两三个礼拜来老是在我的脑子里和口角上盘旋着。闻一多先生的大才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对于民主运动不用说还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就在学问研究上也必然会有更大的贡献的。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和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工夫。就他所已完成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眼光的犀利，考察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信口开河，凡是细心阅读他这《全集》的人，我相信都会发生同感。我现在姑且举两个例子在这儿。

第一，他有一篇《诗新台鸿字说》解释《诗经邶风新台篇》里面“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的那个鸿字。两千多年来读这诗的谁都马虎过去了，以为是鸿鹄的鸿，但经一多先生从正面侧面来证明，才知道这儿的“鸿”是指蟾蜍即虾蟆。古人曾叫虾蟆或蟾蜍为“苦蠷”（见《广雅·释鱼》和《名医别录》），苦蠷就是鸿的切音了，苦蠷为鸿亦犹窟窿为孔，喉咙为亢。而更巧妙的是有一种草名叫屈茼的，别名也叫着鸿。《淮南子·坠形篇》“海间生屈茼”，高诱注云“屈茼，游龙，鸿也”。这确实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虾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轻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却打到了虾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含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

其次，再举《天问释天》里面解释“顾菟”的一条吧。“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这是问的月亮的情形。向来的人都把顾和菟分开来，认为顾是顾

望，而菟就是兔子。到了清代的毛奇龄，认为顾菟不能分开，是月中的兔名，算是进了一步。直到闻一多先生，才又举了十一项证据来，证明顾菟就是蟾蜍的别名。蟾蜍一名居端，与顾菟实一音之转。同一转语则为科斗为活东，与蟾蜍实为一体。《汉少室神道阙》刻月中蟾蜍四足一尾，宛如科斗后期之形，故知顾菟亦即科斗。闻先生举了十一个例以证成其说，虽然他还在浩叹“既无术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为吾质，则吾虽辩。其终不免徒劳乎？噫！”但我敢于相信，他的发现实在是确凿不易的，并不是“徒劳”。

像这样细密新颖地发前人之所未发的胜义，在全稿中触目皆是，真是到了可以使人瞠惑的地步。这样一位富有发明力的天才，我隐隐地感觉着，可惜是用在文字或文献学这一方面来了，假如是用在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方面，不会成为更有益于全人类的牛顿和爱迪生吗？我固然无心要在文献学和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中定出轩轻，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理文献或文字，其实也就是科学，但如站在功利的立场，那价值的广狭，的确是大有由旬的。虽然在中国也尽有的是这样的功利学者，认为一个古字古义的发明实不亚于天文学家发现了一个星球。或许是吧，但我并不想那样夸张地看，我相信闻一多先生也不会那样夸张地看的。

闻先生治理古代文献的态度，他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大师们的考据方法，而益之以近代人的科学的致密。为了证成一种假说，他不惜耐烦地小心地翻遍群书。为了读破一种古籍，他不惜在多方面作苦心的彻底的准备。这正是朴学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多是把这种精神澈底地实践了。唯有这样，所以才能有他所留下的这样丰富的成绩。但他的澈底处并不是仅仅适用于考据，他把考据这种工夫仅是认为手段，而不是认为究极的目的。请看他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上所说的这样的话吧：

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亡羊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伪误，往往也误人不浅。《楚辞》恰巧是这三种困难都具备的一部古书，所以在研究它时，我曾针对着上述诸点，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

凡是古书，这三种困难都是具备着的，事实上并不限于《楚辞》，因而他所规定的三项课题，其实也就是研究古代文献上的共通课题；尤其是第一项，那是属于文化史的范围，应该是最高的阶段。但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实在还没有产生过一部好的文化史。专家的研究也是同样的。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清儒又回到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越。这是当然的，要想知道“时代背景”和

“意识形态”，须要超越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才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不用说是更不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就像孩儿期中孩儿自身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和意识一样，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停滞也就必然地汇成了封建意识的污渚。要澄清这污渚，今天正是时候了。

我们再看一多先生的《楚辞校补》的《引言》中叙述着他的苦衷吧。他认为他所拟定的三项课题，最好是同时交卷，然而为情势所迫，他一时不能够全部完成，“只好将最下层，也是最基层的第三项——校正文字的工作，先行结束，而尽量将第二项——诠释词义的部分容纳在这里。”他认为这是“权变的办法”，是他所极不愿做的。然而为了“可以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他终于这样做了。这《引言》是写于民国三十年的十二月八日，也正是民主运动开始发动的时候，我们看他这急急于想“腾出时间来多作点别的事”的苦心，不可以看出一多先生以后的活动是早有部署在心的吗？但我在这儿注意地引用到这段文字的用意倒侧重在他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具有全般的计划，而且在完成计划的各个步骤上的评价他是丝毫也没有陷于自我陶醉的。“校正文字”和“诠释词义”的工作，这些正是考据家们的所兢兢焉乐道的事业，而在他只是基本的准备工作，而且“校正文字”还只是“最下层”。这不明显地表示着，他丝毫也没有把自己的工作做过分的夸大吗？他的《楚辞校补》在他自己看来既只是第二第三阶段上的作品，我们准握着这同一的自白，也可以知道，他对于他的《周易证类纂》《诗经新义》《诗经通义》《庄子内篇校释》《离骚解诂》等，这样一连串的在文字训诂上极有价值的文字，在他自己也不过是视为第二第三阶段的工作吧了，其实这些著作，当代的考据家们，假使能有一篇，也就尽足以自豪的。事实上他们一篇也没有，已经就在自豪了，一些旧式的或新式的卫道者，不是根本连字都不认识，便在那儿以仲尼复活、墨翟再生自命吗？闻先生不是这样的糊涂虫，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是为了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为了要扬弃古代而钻进古代里去剖它的肠肚的。他有目的地钻了进去，没有忘失目的地又钻了出来，这是那些古籍中的鱼们所根本不能想望的事。

三十年的五月三日晚上，在昆明的联大新舍南区教室里，曾经举行过一次“五四”历史座谈，据记录，在周炳琳、张奚若等先生发言之后，闻一多先生发言。他曾经这样说过：

刚才张先生说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怀。但是你们现在好像是在审判我，因为我是在被革命的系——中文系里面的。但是我要和你们里应外合！

他这就是说钻进“中文”——中国文学或中国文化——里面去革中文的命。他说

“封建社会的东西全是要不得的。我相信，凭我的教书经验和心得，它是实在要不得的。中文系的任务就是要知道它的要不得，才不至于开倒车”。今天搞中文的人谁个是这样的抱负？旧式的卫道者不用说他了，就拿现在一些搞“国文”的新式学者来说，不是月月都在那儿祖述桐城，甚至还在赞扬八股吗？那些君子不用说不是中文的革命叛徒，简直是唐宋盛世的辅命功臣了；要说猗欤休哉，也的确是值得说一声猗欤休哉的！

然而一多先生却不是这样的功臣！他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这就是他的治学的根本态度。为着要得虎子而身入虎穴，决不是身入虎穴去为虎作伥。他在写考证文字的时候照例使用文言，但他认为“未能免俗”，他梦想着要用白话文来写考证文字。这也是见于《楚辞校补·引言》里的话，可见他在迫不得已使用文言时，都没有忘记要扬弃文言。但他在第一阶段的工作——即最上层的批判时代背景与意识形态上，他是断然把文言扬弃了的。这段工作，他虽然做得不多，但已经开始在作，而且在作的过程中，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已经有了变迁和改进，也是可以明白地看出的。这可以把他的《庄子》和《人民诗人——屈原》两篇文章拿来作证明。

一多先生不仅在《庄子》的校释上做了刻苦的工夫，他另外有一篇题名就叫“庄子”的论文，直可以说是对于庄子的最高的礼赞。他实在是在那儿诚心诚意地赞美庄子，不仅陶醉于庄子的汪洋恣肆的文章，而且还同情于他的思想。请看下面的这些摘录吧。

有大智慧的都会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想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

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妇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精神。

读《庄子》的人，定知道那是多层的愉快。你正在惊异那思想的奇惊，在那踌躇的当儿，忽然又发觉一件事，你问那精微奥妙的思想何以竟有那样凑巧的曲达园妙的辞句来表现它，你更惊异；再定神一看，又不知道那是思想那是文字了，竟许甚么也不是，而是经过化合作用的第三种东西，于是你尤其惊异。这应接不暇的惊异，使你加倍地愉快，乐不可支。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文中之支离疏，画中的达摩，是中国艺术里最特色的两个产品。正如达摩是画中有诗，文中也常有一种“清丑入图画，视之如古铜古玉”（龚自珍《画金伶》）的人物，都代表中国艺术中极高古、极纯粹的境地；而文学中这种境界的开创者则推庄子。……这种以丑为美的兴趣，多到庄子那程度，或许近于病态；可是谁知道，文学不根本便犯着那嫌疑呢！

这和《死水》中所表现的思想有一脉相通的地方。你看他那陶醉于庄子的“乐不可支”的神情！他在迷恋着“超人”，迷恋着“高古”“神圣”“古铜古玉”“以丑为美”（《死水》的主要倾向便在刻意于此），甚至于迷恋于庄子的“道”，“认识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的是“有大智慧的”人，意在言外地憧憬着要“像庄子那样热忱地爱慕它”。庄子的“道”是什么？那是我们中国古代的黄老学派所悬拟的宇宙万汇的本体。眼

前的宇宙万汇是可视可闻可臭可触的感官界，但这感官界的来源是有一个超越于感官的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臭不可触的实质的本体；那本体的名字就叫着“道”。宇宙万汇都是这“道”的化身，一切变化都是“道”的活动。“道”是宇宙万汇的创化者，也就是宇宙万汇的真正的主宰者（“真宰”）。所以“道”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前一个时代的所谓“上帝”的混沌化，“上帝”是有眼耳口鼻的人形，“道”是没有眼耳口鼻的混沌而一。万物都是“道”，也就是说万物都是神。庄子的思想在我们中国古代本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和印度的古代和希腊的古代某些形而上学家的想法是共通的，在反对神、反对宗教、反对建立在教权上的统治方式上，很有足以使人迷恋的地方，而加以庄子的古今独步的文章，的确是陶醉了不少的人。我自己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极端崇拜庄子的一个人，就是晚年来反对庄子最力的鲁迅，他也很称赞庄子的文章，甚至于也沾染过庄子的思想。鲁迅自己说过：“这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子和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写在坟的后面》）但鲁迅是从庄子思想中蜕变了出来，闻一多也同样把庄子思想扬弃了。

闻一多扬弃了庄子思想，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表现在他日后一转尔痛骂道家了。

一个儒家做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关于儒·道·土匪》）

他斥墨家是土匪，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他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说墨不如儒，儒不如道。”这是把道家思想清算得很痛快的。

如其从对于文化史的贡献上来说，这层思想的转变可以说很具体地表现于他的由庄子礼赞转而屈原颂扬。

我们在上述《庄子》一文中看见他以屈原和宋玉并称，说“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没有庄子伟大，这完全是一种旧式的看法。但在《人民诗人——屈原》里面，看法便完全不同了。“是什么使得屈原成为人民的屈原”的？他举出了四种原因。第一，屈原虽然是楚国的同姓，却“早被打落下来，变成一个作为宫廷弄臣的卑贱的伶官。……这样，首先在身分上，屈原便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中的”。第二，“屈原最主要的作品——《离骚》的形式，是人民的艺术形式。……次要的作品——《九歌》，是民歌”。第三，“在内容上，《离骚》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第四，“屈原的死，更把那反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字鼎堂，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等。四川乐山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